

数字普惠金融对安徽省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

张雨

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 近年来, 经济和技术飞速发展, 但“三农”问题仍然存在, 实现农民增收是目前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金融服务的普惠性需求, 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来扩大农民收入, 对于促进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安徽省为研究对象, 研究运用了安徽省 2011-2021 年 16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 发现其增长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户收入的增长。此外, 将安徽省划分为皖中、皖南与皖北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皖南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强, 对皖北地区影响较弱。研究建议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加强农村金融知识普及和区域差异化支持, 进一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作用, 助力乡村振兴。

关键词: 农民收入; 固定效应模型; 数字普惠金融; 机制分析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Farmers' Income Level in Anhui Province

Zhang Y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Nanjing, China Jiangsu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economy and technology have developed rapidly, but the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still persist.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is currently the top priority in solving these issues. The emergenc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largely met the inclusive needs of financial services. Utilizing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to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is of far-reachi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social fair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Anhu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uses the panel data of 1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Anhui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21 and finds that its growth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In addition, Anhui Province is divided into central, southern, and northern Anhui regions for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the stronges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southern Anhui region and a relatively weak impact on the northern Anhui region. The research suggests optimizing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olicies, strengthen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rural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providing regional differential support to further give play to the poverty-reduction and income-increasing rol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contribute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Farmers' income; Fixed effects model;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Mechanism analysis

0 引言

近几年, 中国农业人口收入处于逐步攀升阶段, 党的二十大也清晰地指出了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和鲜明特征, 也是推动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任务, 关键在于消除贫困和提高农业人口生活质量。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业新质生产力”作为核心议题之一, 首次系统性提出相关部署要求, 聚焦科技创新驱动、要素高效配置、产业转型升级三大主线, 明确了未来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农业新质生产力, 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 通过现代技术、数字化手段和新型经营模式, 全面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资源利用效率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新型生产力形态。与传统农业相

比, 农业新质生产力更注重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 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数字普惠金融属于一种新兴前沿技术领域, 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运用数字科技打通时空鸿沟, 向各类人群提供平等便利的金融产品服务与金融服务, 极大程度上增强了金融普惠性、降低了金融成本, 在农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与城乡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内在联系, 通过严谨的实证分析与理论探究, 明确数字普惠金融在提升农民收入水平方面的具体作用机制与成效。对农村金融政策制定具有关键指导作用。

1 理论基础

1.1 金融排斥理论

金融排斥的研究从 1995 年 Leyshon 和 Thrift 提出的金融排斥理论开始, 该研究第一次对金融排斥进行了阐述, 描述了那些由于贫穷或其他原因无法得到他们需要的金融服务的群体被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的现象, 这些原因包括失业、缺乏经济来源、较低的居住条件、低收入和身体状况等。根据金融排斥产生的原因及其性质, 可将其细分为 6 类, 分别是地理排斥、条件排斥、价格排斥、营销排斥、评估排斥与自我排斥^[1]。

1.2 普惠金融理论

2005 年, 联合国首次明确界定了“普惠金融”这一创新理念, 其核心在于为经济弱势群体提供长期稳定的金融服务, 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弱势群体的筹资渠道, 这不仅是对传统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体系的深化与扩展, 更是对整个社会金融体系的一种全面革新。普惠金融也被称为包容性金融, 其核心理念在于让金融服务和金融服务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群体, 而是广泛地覆盖到社会各个阶层, 使社会上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现代金融带来的便利。

在当今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的背景下, 数字普惠金融由普惠金融发展而来, 运用高端信息技术, 能够为农民提供更多更具开放性、便利化、普及化的金融服务和产品, 让原来被排斥在金融系统之外的广大农村贫困人口也享受安全的、合理的、规范化的金融服务。另外, 通过数字技术逐步实现对数据、风险、结果等的实时采集、智能分析与自动处理, 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2]。普惠金融理论为本文深入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机理分析提供理论支撑。

2 文献综述

从 Shiller(2013) 的探究中可以得知,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在降低金融服务所需成本的同时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金融服务, 这将促进农村贫困人口积累收入, 有效延缓了农村的贫困程度的恶化, 最终能够直接或者间接的增加农业劳动者的收入^[3]; Bauer(2018) 又进一步强调, 数字化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地帮助缓解城乡间的贫富差距, 优化社会资源配置, 进而能够稳定地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4]。张林 (2021) 则通过在中国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之间进行比较发现,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可以直接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增加, 而且还可以通过相关的产品产业链升级间接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5]。YuPing 和 FengYaqin(2021) 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对农户收入产生显著影响作用, 他们进一步验证出这种影响是通过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来实现的^[6]。张兵等 (2022) 指出,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加强农民劳动能力并进而提升其收入, 其中在极度贫困人口当中表现得尤其明显^[7]。LiangFanling 通过研究指出, 数字普惠金融

有效改善农民收入水平^[8], 主要的路径则是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孔杏 (2020) 认为, 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提升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 对提高农村人口收入水平的效果会更加显著^[9]。李牧辰 (2020) 提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 因为可以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特定性质的金融服务来提高农村的金融可得性, 也就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10]。学者张海燕 (2021) 采用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作用, 其结果显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有显著正向贡献, 且对工资性收入的贡献最大^[11]。徐宁宁 (2021) 研究发现, 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会促进农民增收, 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直接效应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12]。刘自强和张天 (2021) 通过空间统计分析的方法, 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区居民收入及其来源的影响展开研究, 并得出结论,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工资水平、增加工作岗位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进而提高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13]。

3 实证分析

3.1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3.1.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需的主要解释变量取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2011-2021)》这一较主流的由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与蚂蚁集团研究院联合发布的指数。其他变量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及各区域分册公开发布的数据。鉴于收集完整方便, 本文选取安徽省 16 个市 2011-2021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同时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 本文也采用了对非比值型指标做对数变换来消除异方差。

3.1.2 指标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 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 2011-2021 年安徽全省 16 个城市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农民收入这一主要指标。同时, 为确保稳定, 也对农村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2) 解释变量。通过相关资料的查阅显示, 截止目前为止, 学术研究使用最多最为权威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由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蚂蚁金控集团研究部合作推出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本文使用该指数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同时为了保证数据的序列的稳健性, 对其进行取对数处理。

(3) 控制变量。教育水平 (Edu): 增强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有利于其更好地理解金融政策、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 提升风险辨别能力和金融活动的参与程度, 进而增加收入。本文以用于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占比来衡量。

财政支农水平 (Gov): 指政府对农林牧渔业的扶持; 政府对农林牧渔业的扶持可以美化农村居住环境, 提高农村的农林牧渔业的生产效率, 增强农民的经济收入等。文

影响极大,表示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提高 1%,农民收入的增加值为 0.381%。对于农村居民来说,他们的受教育程度(Edu)对其收入的影响极大,受教育程度高了对于金融的认识程度也就会提高,他们也会有更多参与金融活动的机会,农民能够更自如地运用金融工具,对于收入增长也是极大的。财政支农力度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回归系数是 1.353,呈显著的正相关性,财政支农水平越高,农村居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组织性就越高,从而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技术水平(Tech)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回归系数为 2.367,显著为正,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为农业生产提供更高质量的农业服务技术和农业服务产品,能够促进农民增收。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大量的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条件、提升自身经济收益。经测算,当城镇化水平越高,农民的收入也会相应提高。当城镇化水平提升一个百分点,农民的总收入就会增加 1.9 个百分点。以上控制变量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促进农村居民的收入。

3.3.2 机制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本文引用经济发展水平来分析机制路径,即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的机制路径是否为:“数字普惠金融—经济增长—农民收入”,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机制变量考察其机制效应,借鉴了江艇的双步骤法^[14]。

由检验结果可知,以经济增长(LGDP)为机制变量检验时,根据已经设定的机制分析模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总效应是 0.381,在 1% 的水平上显著,通过了第一步机制分析;数字普惠金融能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即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经济发展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回归系数是 0.407,通过了第二步机制分析。

李英杰(2022)在农业科技投入、区域经济增长与农民增收效应研究中指出,区域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地区间差异不大^[15]。陈玉星(2022)在研究中国农民收入质量评估及影响因素时提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收入质量有显著影响,且影响方向为正^[16]。以上现有研究成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机制路径得到检验。

3.3.3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前文实验结果的可信度,考虑到实际经济现象的滞后性,数字普惠金融的研发到投入使用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本文使用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由实证结果可知,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均在 1% 的水平下正向显著,表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在长期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3.3.4 内生性检验

内生性检验是进行实证模型回归过程中另一个重要步骤。造成内生性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种是由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双向作用产生的问题;第二种是由于存在遗漏变量,即应考虑并对相应变量进行修正而实际未加入模型中的变量;第三种是由于测量误差产生的问题。为了避免此问题,我们用工具变量代替关键解释变量的方法,即将数字普惠金融的一期、两期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检验。根据检验结果显示,在三种情况下,数字普惠金融都能显著增加农户收入,并且结果均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有效,结果表明我们的原模型仍然有效。

3.3.5 异质性检验

为进一步探究安徽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根据安徽省地理区位与经济发展情况,将安徽省划分为 3 部分区域:即包括蚌埠市、宿州市、阜阳市、亳州市、淮北市及淮南市的皖北区,包括合肥市、滁州市、六安市与安庆市的皖中区,以及包括芜湖市、池州市、马鞍山市、黄山市、铜陵市及宣城市的皖南区。根据模型(4-1)的结构,我们将各地域进行分组回归。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皖北地区、皖中地区还是皖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增长作用均具有正向显著性。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对皖南地区农户收入增长影响效果最大,达到 0.439;对皖北地区农户收入增长的贡献效果最小,达到 0.261。可能的动因是:一是皖南地区经济发展状态较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形成有着较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二是皖南地区具有优良的自然条件优势,地理位置上更靠近江苏省的省会南京市以及江苏省富裕的苏南地区城市圈,经济发展会间接被江苏省的发展带动,所以一定程度上皖南地区的发展要较优于皖北地区。而皖北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平均发展水平较低,且地貌多以平原为主,地势较为平坦,田地充足有助于进行农业生产,但人口众多,如阜阳市和亳州市都是人口大市,故人均收入就相对较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正向影响效果就不如皖南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果较弱。

4 研究结论

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提高。总体上,安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家庭收入有积极影响。提高 1% 的数字普惠金融总量指标会引起农民收入提高 0.381%。

经由经济增长这个机制指标,得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其作用机理主要表现在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都能起到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由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当地的农业生产收入有促进作用,由此可以检验到该机制路径。

安徽不同区域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其农户收入的影

响效应不同。将安徽省区域分为 3 部分：皖北、皖中和皖南进行研究，我们发现皖南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其农户收入提升影响最大，影响指数高达 0.439，而皖北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户收入影响是最低的，影响指数仅为 0.261。

5 结论

从整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民收入有显著的正相关影响，可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结合实证分析结果，现提出如下建议：

5.1 通过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促进农民增收

以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来助力脱贫并增加农户的收入。现下，可以充分借助互联网及数字普惠金融的力量，放宽贷款门槛和减少交易费用等形式向小微企业提供海量的资金支持，从而带动小微企业实体经济的发展，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5.2 提高对当地农民的教育投入

加大对农村地区金融知识的宣传教育培训工作。当前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门槛，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金融知识储备不足等诸多原因导致了新型的金融产品难以在农村地区普及和使用。要突破这个困难，就要多措并举提高农民金融素养。

5.3 依据区域异质性，实施差别化和针对性的政策

为了实现不同区域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均衡发展的目标，建议政府能够实行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的不同向其提供更加精准的支持和服务。尤其是在农村和西部偏远地区增加金融设施建设支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范围和技术含量，可以有效提高农民的金融服务可得性和满意度。

参考文献：

- [1] 高慧.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金融排斥问题研究[D].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8.
- [2] 安琪. 农村产业融合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D].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3.
- [3] Shiller R J. Reflections on finance and the good societ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103):402-405.
- [4] Bauer J M. The Internet and Income Inequality:

Socio-economic Challenges in a Hyperconnected Society[J]. 2018(04): 333-343.

- [5] 张林. 数字普惠金融、县域产业升级与农民收入增长[J]. 财经问题研究, 2021(6):51-59.

- [6] Yu Ping and Feng Yaqi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Farmers' Income Growth[M]. Atlantis Press SARL, 2023:243-261.

- [7] 张兵, 李娜. 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与农户增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2,43(2):249-260.

- [8] Liang Fanling et al. The Role of E-commerce Development in Promoting Farmers' Income Growth through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 Intermediary Effects Perspective[M]. Atlantis Press International BV, 2023: 29-34.

- [9] 孔杏. 数字普惠金融、空间溢出效应与收入增长——基于城乡二元总体实证分析[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20,(03):61-68.

- [10] 李牧辰, 封思贤, 谢星.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20(03):132-145.

- [11] 张海燕.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结构影响的异质性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21,37(24):152-156.

- [12] 徐宁宇. 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民增收效应研究[D]. 广西师范大学, 2021.

- [13] 刘自强, 张天.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J]. 当代经济研究, 2021(12): 93-102.

- [14]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05):100-120.

- [15] 李英杰. 农业科技投入、区域经济增长与农民增收效应研究——基于山东省 2010—2018 年面板数据[J]. 山西农经, 2022,(02):5-7.

- [16] 陈玉星. 中国农民收入质量评估及影响因素研究[D]. 安徽财经大学, 2022.

作者简介：张雨（2002—），女，汉族，安徽省，本科，研究方向：数字普惠金融。